

全球化之下中國大陸研究生 教育的發展與轉型*

王 瑞 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教育體制於 1980 年代初重建，1993 年之後快步發展，其在校生成人數於今僅次於美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國。與之同步的是功能和體制的多元化。本論文分析指出，此一發展和轉變是藉由國際發展潮流的引進，在傳統國家的規劃與主導之下而達成。這個全球在地化的策略展現了高度的效能，不但促成了蘇聯舊制轉向美式體制，使之與國際接軌，更完成了新金字塔的建構，強化了菁英大學的競爭力。以上之發展值得台灣學界參考，特專文分析之。

關鍵詞：研究生教育、全球在地化、國家控制

* * *

壹、研究背景

現今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於 1950 年代初仿蘇聯體制建立，1962 年至 1965 年之間，僅招生 4,764 名學生^①，就遭遇到文化大革命。1997 年研究所恢復招生，1980 年學位條例頒布，學位委員會成立，審定碩、博士生資格，至 1984 年已有 358 所大學開設研究生教育。不過，當時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心在於培育現代化人才，以 4 年本科教

* 本論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NSC 95-2413-H-004-005)，96 學年度國立政治大學頂尖計畫部分成果。本論文經兩位審查人之提醒和指點修整之後，更為聚焦，謹此致謝。

註① 劉輝、侯春山編，中國研究生教育和學位制度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3~9。

育為主，承擔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人才的研究生教育並非主流，其在校人數於 1980 年代中期之後達到 3 萬人高峰之後成長趨緩，以至停滯，1989 年六四學運發生的那一年，更降至 2 萬多人。除了政策刻意的壓縮造成此一現象，當時就業市場存在著高學歷低就業，「腦體倒掛」的問題，使得研究所投資收益偏低，亦導致生源流失，而其悲情於 1989 年六四學運結束之後達於極點，直到 1992 年市場經濟推動才得反轉^②，此後每年的招生人數以二位數的比例成長，以至 2005 年其在學人數高達百萬，僅次於美國。

自 1980 年代初體制重建之後，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就捨蘇聯模式，改以歐美，尤其是美國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為典範調整，至 1990 年代中期之後更隨著國際潮流快速調整，走向多元化，於今不但成為菁英大學追求卓越，與世界名校交流和建立合作的管道，亦成為西方國家博士後的供應站，成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指標。是以研究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其研究生教育體制之轉型是一理想的起點。

1990 年代初以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並與世界接軌，成為西文學者研究的焦點之一。相關之研究，最多見者是從全球化中的權力下放、鬆綁、市場化等角度分析之，而其共同之結論是前述之改革均是在傳統國家控制的框架之下進行，所謂的市場化與歐美差距甚大^③。Ross and Lou 從全球在地化的角度論之，認為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因缺乏批判的能力，以致出現商業化的現象，使得在地化方面的成就不彰^④。中國大陸旅澳學者 Rui Yang 批評全球化與市場化、資本主義無異，只會導致中國高等教育商業化，犧牲龐大貧困生的權益，因此改從國際化的角度論之^⑤。他認為新世紀之初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結合了國際化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特質，是其他許多亞洲國家所未見，展現大陸本土學界對於本土文化的自信^⑥。

對於全球化、國際化的區別，Jane Knight 提出如下解釋。國際化著重在國家概念，指向不同國家或政府之間的關係。全球化指向全球範圍，不特別強調國家的觀念^⑦。本論文採用從全球在地化的角度探討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與

註② 有關 1980 年代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請參閱王瑞琦，「論九〇年代大陸『考研熱』與研究生教育之走向」，*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5 期（1999 年 5 月），頁 85-104。

註③ 有關此分析，請參閱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台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 14-18。

註④ Heidi Ross, Jingjing Lou, "'Glocaliz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Groping for Stones to Cross the River,"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12, no.1 (Winter 2005), pp. 227-250.

註⑤ Rui Yang, *Third Deligh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66-83.

註⑥ Rui Ya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Its Meanings, Rational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vol. 13, no. 1 (March 2002), pp. 81-94.

註⑦ Jane Knight,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8, no. 3 (2004), p. 8.

體制轉型。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本研究之重心並不在於探討研究生教育國際化的本身，而是過去 20 多年，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體制是如何在國際潮流和傳統的發展模式之間取得平衡之下轉型。另一個原因是過去十多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政策中見到最多的是「與國際接軌」、「全球化」。

1980 年代初，文革結束未久，前國家領袖鄧小平就提出三個面向作為教育發展的新方針：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唯因當時，面向世界的內涵尚付之闕如，現代化成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動力^⑧，直至 1980 年代後期有商品經濟論的提出，卻是爭議大於共識，於六四學運爆發之後成為批判的目標。1992 年市場經濟開展，市場機制引入。對於高等教育而言，最大的改變就是其發展的重心從面向現代化轉至面向世界。初時，就只是單純的走入國際社群，1990 年代中期之後，國家的智囊就以全球化、「與國際接軌」、國家競爭力為訴求，強調應集中資源發展高科技和培育國際型人才的途徑追趕歐美國家，稱其為「跨越式」發展^⑨，而加速高等教育發展並與國際接軌成為主要的策略。1998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未言國際化，但是在第 12 條以單行明言鼓勵和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⑩。次年，「與國際潮流接軌」之語即開始出現於相關的媒體報導當中，隨即快速散播^⑪。2003 年 3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佈，其條文中論及「國際」二字的有兩處：一處是引進國際上具有先進性的課程和教材；另一處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加入的國際條約辦理外國教育機構的學歷和學位證書的承認。「國際化」三字依舊缺席^⑫。

對於高等教育全球化，西文之研究分從三個角度論之。一個是聚焦於趨同性的發展 (convergence)，其帶有線性的、帶有命定性的因果特質；另一個是著重在地化，包括了反抗與衝突。第三種則是嘗試結合兩方的觀點，提出了 glocal (全球在地化) 或是 glonacal (全球—國家—地方三結合)^⑬。儘管至今全球在地化的定義、內涵和研究方法仍待學界努力探索，愈來愈多的學者體認到全球化並非是一個單向的過程，而是夾帶了原本各國專屬的特色。正如 Marginson & Rhoades 所言，現今各國的高等教育是在

註⑧ Heidi Ross, Jingjing Lou, *op.cit.*, pp. 227-250.

註⑨ 有關跨越式發展，請參閱王瑞琦、胡宇芳，「國家控制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 (2004 年 12 月)，頁 75-105。

註⑩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26.htm>。

註⑪ 在會議或訪談中，許多大陸學者一再提醒，報紙媒體是瞭解中國大陸政策形成的主要管道。據此，作者使用 Wisenews 資料庫，以高等教育→國際接軌兩個關鍵詞查詢，發現該資料庫內中國大陸報紙媒體報導中有關高等教育與國際接軌之語，在 1999 年時為 2 次，次年增至 81 次，2001 年為 192 次。

註⑫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中國勞工通訊*，<http://big5.china-labour.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6010&item%5fid=6009>。

註⑬ 有關高等教育全球化之理論，請參閱 Massimiliano Vaira,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vol. 48, no. 4 (December 2004), pp. 483-510.

全球和在地化兩個因素同時運作之下發展的，因此探討高等教育全球化時，應跳脫全球化對於在地制度的線性效應，或是表面的現況發展和政策產出，而是要關注在趨同性發展中，各國所特有的機制和運作^⑭。

基於上述之理由，本論文從全球在地化的角度探究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轉型與發展，不僅有助於吾人瞭解其走向國際的策略、特質和前景，亦有助於吾人更深入瞭解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特質。以下即先就 20 世紀後期，國際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潮流分析之。

一、20 世紀末世界研究生教育的趨同性發展

20 世紀前半期，世界各國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在於培育學術和教學人才，並且各自依其傳統發展，各具特質。1970 年代初，美國研究生教育率先快速發展，於 1973 年至 1985 年之間，其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人數成長兩倍，法律碩士畢業生人數成長三分之一，1997 年，碩士畢業生人數已高達 406,000 人之多。1900 年博士畢業生人數僅 400，1920 年也只有 600 人，1997 年卻高達 45,000 多人^⑮。英國的研究生人數在 1961 至 1962 年之間僅 26,700 人，其於 1980 年代之後加速發展，以至 2000 至 2001 年之間，已多達 448,700 人，並且持續躍增^⑯。而韓國的研究生人數，於 1992 年至 2002 年之間，從 97,000 人增長至 260,000，成長 168%^⑰。同樣的，日本的研究生人數於 1985 年只有 69,688 人，至 1998 年躍增至 178,829 人，成長 157%，根據日本教育官員的估計，2010 年最少將會達到 250,000 名^⑱。以上之快速發展有兩個共同因素。其一，就是眾所周知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一方面驅使國家各國開發人力資源，致力於人力資本投資，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⑲，另一方面改變就業市場生態和需求，使之走向知識化與專業化，令在職者紛紛返回校園進修。其二是 4 年大學本科教育高速擴張，大學文憑氾濫，驅使就業市場以學校出身、學歷、專業技術作為篩選的標準，以及大學生畢業之後，繼續接受更高一層的專業訓練^⑳。

註⑭ Simon Marginson & Gary Rhoades, "Beyond National States, Markets, and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A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 *Higher Education*, vol. 43, no.3 (2002), pp. 281~309.

註⑮ Frank H.T. Rhodes, *The Creation of the Future: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2001), pp.120~126.

註⑯ David Scott, Andrew Brown, Ingrid Lunt and Lucy Thorne, *Professional Doctorates: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Knowledge* (Maidenhead,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註⑰ Philip G. Altbach & Toru Umakoshi eds., *Asian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1.

註⑱ L. I. Okazaki-Ward, "MBA Educ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 20, no. 3 (2001), pp. 205, 210.

註⑲ Martin Carnoy and Diana Rhoten, "What does globalization mean for educa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6, no. 1 (February 2002), pp.1~9.

註⑳ Alison Wolf, *Dose Education Matte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2).

在快速發展中，許多國家的研究生教育體制出現了以下 4 個趨同性的發展：

第一，朝美式體制轉型。以歐洲為例，1980 年代以前，各國的研究生教育各依其傳統發展，彼此之間缺乏共通性和可比性。1986 年 11 月，*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特為之開闢專刊，供德、法、瑞典、荷蘭等學者檢視各自國家研究生教育發展的特質和找尋新的方向^①。前所提及的波隆那之宣言與接續的會議決議，代表簽署國發展研究生教育的指標。

1999 年，29 個歐洲國家共同簽署「波隆納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 提出 2010 年成立「歐洲高等教育區」(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的構想，其中一項決議是仿效美國教育體制，將學士／碩士生教育相連結。此一會議至 2006 年已舉行 3 次，參與國家數增至 45 個，當年所擬的發展目標中增加了終身教育、博士生訓練、學歷採認^②。

第二，研究生教育功能多元化，其不再只是培育學術研究或是大學師資，更強調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育，除了傳統的學術型 (academic) 碩、博士生教育，亦有以培育高級專業人才為目標的學程或是專業學位 (professional degree)。碩士生教育的發展重心，從建立學生學術研究基礎轉向專業人才的培育，護理、餐旅、聽力治療等等傳統上被歸類為技術導向的行業終於得以進入碩士培訓學程，甚至進入到博士的層次，為各類行業，以至政府機構培育具有專業素養的應用型人才^③。2003 年歐洲高等教育部長會議提出發展博士生教育時，即聚焦於專業學位^④。

第三，市場化與國際化：擴張帶來機會和競爭，其中最具吸引力，競爭最激烈的應是國際學生的招收。學者指出，1980 年代之後，經濟效益成為高等教育擴張的主要動力，競爭的焦點不是那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或是那一所大學最優秀，而是在國際市場中的佔有率^⑤。

第四，高等教育機構的層次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提高其競爭力，吸引各國菁英人才，確保其聲譽不墜，傳統的研究型大學競相進行課程改革，以企業理念進

註① Stuart Blume,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Dilemma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21, no. 3 (1986), pp. 217-222; Mary Henkel and Maurice Kogan, "Research Training and Graduate Education The British Macro Structure," in Burton R. Clark 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 Germany,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71-114.

註② Martin Vogel, "Diversity and Comparability—Towards a Commo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November 16, 2006,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8g855120122t4520/fulltext.html>.

註③ Frank H.T. Rhodes, *op.cit.*, pp.115-135; Jody D. Nyquist, "The Ph. D: A Tapestry of Cha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Change*, vol. 3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p. 13-20.

註④ Jeroen Huisman and Naidoo Rajani,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 From Anglo-Saxon to European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 18, no. 2 (2006), pp. 1-13.

註⑤ Gary Rhoades, "Globally, Nationally, and Locally Patterned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l. 43, no. 3 (2002), pp. 278-309.

行課程創新，提升研究生教育品質^⑥，同時積極於校際之間策略聯盟^⑦，以致國際合作，拓展外部資源。制度的改革與創新，以及資源的擴張拉大了大學之間的距離，例如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菁英大學法律系研究所學生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率近乎九成，遠超過其他一般大學的七成^⑧。受到高等教育追求卓越政策的影響，歐洲和亞洲諸多國家的研究生教育均出現集中於少數菁英大學的現象，強化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層（stratification）。

如前所提，全球化的過程中含蓋了各國特有的制度和環境因素。例如，在韓國，知識經濟和全球化、高等教育大眾化等共同因素之外，女權的提升和女性研究生人數的躍升亦為主要動因。在日本則是少子化與大學生源的縮減，迫使大學將發展的重心轉向研究生，同時人口老齡化帶動終身教育的發展^⑨。關於歐洲方面，於 1986 年 11 月，*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的專刊中可看到英、德、法、瑞典、荷蘭等國家研究生教育發展之差異與各有之特質。

由於背景、特質相異，各國發展的步調亦不同。日本受制於大學和企業分別承擔學術人才和專業人才培育的傳統，研究生教育發展相對遲緩，是以學界建言政府政策鬆綁，為大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⑩。同樣，波隆那共同決議之後，歐洲各國的研究生教育之走向，除了國家政策，亦繫於個別大學的因應^⑪。

最受矚目的是英國和澳洲。英國於 1980 年代初就開始推動研究生院的設置，同時刪除對歐洲共同市場以外的外籍學生的補助，允許大學自由進入此一市場，自定收費標準，並開設特別學位與課程，更於 1993 年提出「研究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Research Policy），指出傳統博士學位已不能滿足時代需求，開始推動專業學位教育，1994 年成立研究生教育委員會（UK Council for Graduate Education, UKCGE）^⑫。澳洲研究生教育發展於 1980 年代中期起步，其策略與英國雷同，但是政府的介入遠超過英國，其於 1990 年取消對外籍生的補助，允許各大學校直接招外籍生，成立相關管理機制，並直接推動各大學發展專業博士學位^⑬。

註⑥ Richard A. Cherwitz and Charlotte A Sullivan,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hip: A Vision for Graduate Education," *Change*, vol. 3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p. 23-27.

註⑦ Frank Newman and Lara K Couturier, "The New Competitive Arena," *Change*, vol. 3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10-18.

註⑧ Frank H.T. Rhodes, *op.cit.*, p. 116.

註⑨ L. I. Okazaki-Ward, *op.cit.*, pp. 197-234.

註⑩ L. Morikazu Ushio,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Japan," in Buton R. Clark 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 Germany,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99-325; L. I. Okazaki-Ward, *op.cit.*, pp. 197-234.

註⑪ 有關高等教育全球化之理論，請參閱 Massimiliano Vaira, *op.cit.*, pp. 483-510.

註⑫ David Scott, Andrew Brown, Ingrid Lunt and Lucy Thorne, *op.cit.*, p. 27.

註⑬ Jeroen Huisman and Naidoo Rajani, *op.cit.*, p. 5; Sandra Meir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Understandings, Dimensions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vol. 26, no. 3 (2004), pp. 372-373.

對於 199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與轉型，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一向被視為培育社會菁英中的菁英的研究生教育，在過去 10 年的發展和世界潮流接軌的轉型過程中，有那些是引入國際潮流？那些仍是延續傳統的特質？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其成效如何？面對了那些挑戰？其前景如何？

如前所提，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中雖然見到鬆綁、放權、市場化，但是傳統國家規劃與控管的本質不變。據王瑞琦之分析，國家之規劃和控管的主要任務，就是力求菁英發展與地區分佈均衡之間的協調³⁰。本論文即從與國際接軌、國家控制兩方面分析之。本論文之分析是立基於 2005 年以來之相關文獻蒐集，以及其間筆者至大陸大學多次訪談與觀察之所得。本論文首先分析研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與國際潮流接軌之相關政策的調整，其次論述帶動研究生教育擴張、多元化、國際化，並逐漸從蘇聯舊制轉型美制的相關措施。第四部分則是分析襲自 1950 年代以來所形成的菁英取向與地區分佈均衡考量並進的國家規劃之特質。第五部分則是分析過去 10 年的發展策略中所面對的挑戰。最後結論分析其所面對的挑戰與未來的走向。

貳、與國際接軌的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政策之調整

如前所提，198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發展主要在於蘇聯制度的改革與重建，直到 1992 年之後，才開始快步發展，並積極與國際潮流接軌，就研究生教育發展而言，見於以下三個關鍵性的轉變。

一、國家整體發展政策之調整

1992 年之後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政策出現重大的調整，不再強調「摸著石頭過河」，「邊做邊改」的途徑，改以人力資源發展為訴求，而且其層次不斷提高。市場經濟推動之初，只是強調深化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社群，4 年本年教育仍為重心。1990 年代至中期之後，由於中國大陸區域發展差距急遽擴大，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了「全民小康」，作為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以「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協調發展為其基本精神，但是同時也提出了「跨越式」（或高發展模式）的策略，而且重心在後者。跨越式發展以發展高科技，追趕歐美國家為訴求，不但使得人力資源發展的重心逐漸從 4 年本科提升至研究生教育，各種「高層次」人才工程政策隨之而出。

1998 年 8 月 2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高教育法》通過，將高等教育定位為「培養

註 30 請參閱王瑞琦、胡宇芳，前引文，頁 75-105。

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次年，國務院頒發《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提出實施「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11 月，全國研究生工作會議即有「深化改革、積極發展；分類指導、按需建設；注重創新、提高質量」24 字的發展方針^⑤。

2001 年底，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次年推出的「人才強國」戰略便聚焦於高層次人才的發展，特別是具有國際視野，所謂的「國際型人才」，強調集中資源建設三類人才：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根據「人才強國」的規劃。2010 年，研究生在校生人數將達到 160 萬人，2020 年，將達 200 萬人以上^⑥。2003 年胡錦濤為國家領導者之後，更是提出「人本」的口號，將人力資源、人力資本投資作為國家整體發展的主要動力^⑦。

以上一波波的政策成為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動力，並造就了研究生教育「超前（經濟建設）發展」之論。

二、追求卓越政策之推動

對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發展，1990 年代有兩個關鍵性的政策，即「211 工程」和「985 工程」兩大工程的推出。「211 工程」於 1992 年提出，以在新世紀初建設 100 所一流大學為訴求，掀起了大學設置碩士點、博士點，以及博士後流動站的熱潮。「985 工程」是在 1998 年 5 月啟動，將層次提高至建立數所世紀一流大學，並將卓越與國際化結合。進入榜單的 38 所大學均視發展研究生教育為向研究型大學轉型的主要途徑。由於這兩個追求卓越的政策在實際推動的過程中均採取傳統的重點發展的策略，成為研究生教育金字塔建構的基礎。關於此部分，稍後將分析之。

三、專業人才之培育與專業學位之發展

中國大陸的碩、博士生教育的主要功能一直是在培育大學師資與研究人才，直到 1980 年代末才有培育應用型人才之論，至 1990 年代初即開始了專業學位教育的發展。1991 年 3 月，清華大學等 9 所大學獲准試辦 MBA 專業學位，以及《工商管理碩

註^⑤ 曹慧旻，「我國研究生創新教育的現狀及對策研究」，河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 3 月），頁 9。

註^⑥ 關於 1990 年代中國大陸人力資源政策的發展，請參閱王瑞琦，「論加入 WTO 後，中國人力資本發展策略的變與不變」，許光泰等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 6 月 1 日），頁 49-78；王瑞琦、胡宇芳，前引文，頁 75-105。

註^⑦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5zqh/1002849.htm>；「『十一五』規劃欲將『人』字大寫」，中國網，2005 年 1 月，<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Jan/748032.htm>。

士試行培養方案》的頒發。次年 11 月 10 號正式推動建築專業碩士學位³⁸。據筆者訪談所得，建築專業學位設置的主要動力就是要與國際的建築業接軌，因此該專業學位畢業證與證照直接掛鉤，其他的碩士專業學位的畢業生仍需報考證照考試。專業學位的學生不同於一般生，均為自費生。

1993 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出台，為研究生教育的功能重新定位，指出其不僅要培養教學、科研人才，更要培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需的「應用型人才」。隨後即緩招或是暫停招收冷門專業招生，增加社會急需之實用專業招生人數³⁹。1995 年，復旦大學研究生院一項研究成果指出⁴⁰，基於博士生教育發展快速，已不需碩士學位教育補充與替代，後者應走向多樣化，展現其過渡性、中間性之特質，並且應以專門碩士學位為發展的重心，以培養從事本專業的較高的業務工作能力，至於傳統的科學碩士學位應成為博士生培養的準備階段。經過多年的試點與討論，1996 年，「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終於出爐，明言其專業學位的發展在於「培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人才」⁴¹。專業碩士學位的種類開始快速增長，至 2004 年，多達 12 種：工商管理碩士 (MBA)、建築學專業學位、法律碩士、教育碩士、工程碩士、臨床醫學 (碩、博士)、口腔醫學 (碩、博士)、公共衛生碩士、公共管理 (MPA)、獸醫 (碩、博士)、農業推廣碩士。2005 年又新增 4 個專業碩士學位：藝術、會計、體育，以及風景園林。2007 年上半年又再增加翻譯碩士和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將成為各大學開展國際化的新動力。

以上國家政策的轉變與專業學位的發展有兩大成就。其一就是研究生教育的擴張。透過高層次人才發展政策的推動、專業學位的發展，再受到 1992 年之後中國大陸就業市場潮流，因市場經濟推動和外資湧入，從人情關係導向轉變至學歷取向，以及每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高度成長的衝擊⁴²，造就了圖 1、2 亮麗的數據。自 1992 年起，研究所的招生人數不但從負成長轉變成正成長，而且以兩位數的成長比例爬升，於 1995 年稍見停歇，之後又再以兩位數增長，以至 2004 年，在校生人數高達 80 多萬人，至 2006 年人數更超過 100 萬人，僅次於美國。另據表 1，2000 年至 2005 年之間，碩士班統一招生考試報考人數成長之比例亦以兩位數字成長，以及錄率取率從 16.6% 提高至 27.7%。無怪乎，一些受訪的學者稱研究生教育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知識產業」。

註 38 「建築學專業學位設置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 年 11 月 4 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77&infoid=4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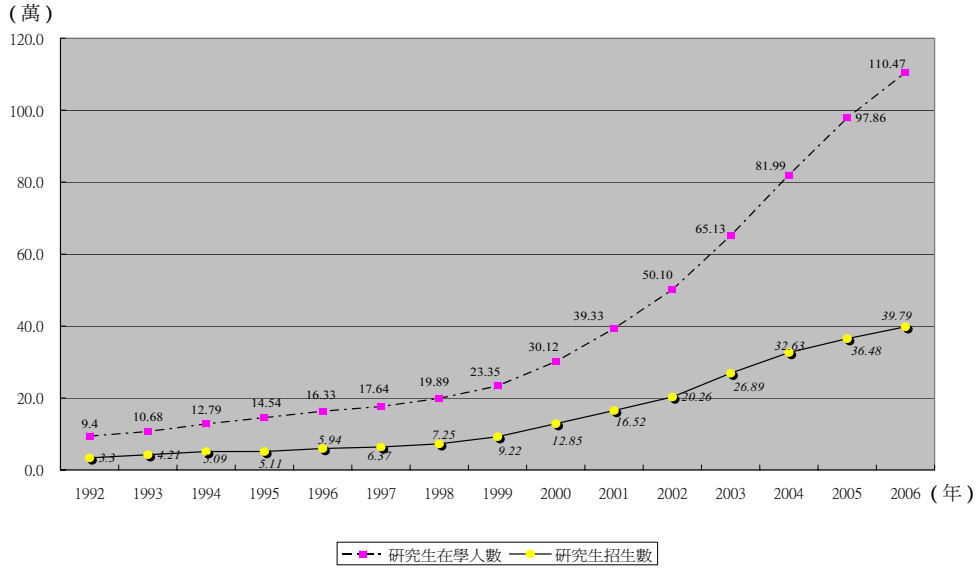
註 39 王瑞琦，「論九〇年代大陸『考研熱』與研究生教育之走向」，頁 85-104。

註 40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課題組，「我國碩士學位類型若干問題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北京)，第 1 期 (1995 年 1 月)，頁 55-59。

註 41 「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 年 11 月 4 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77&infoid=6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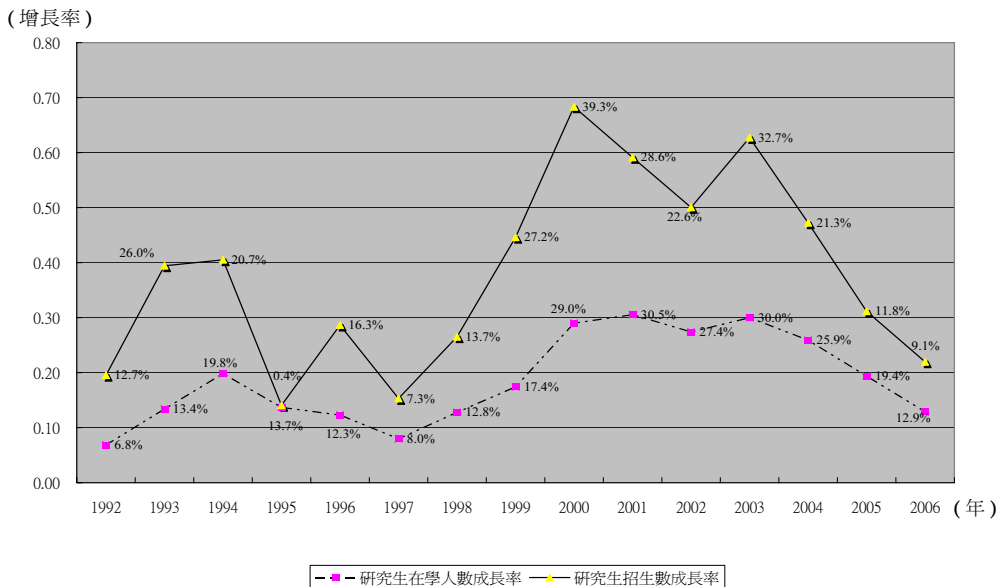
註 42 王瑞琦，「論九〇年代大陸『考研熱』與研究生教育之走向」，頁 85-104。

圖 1 1992~2006 研究生招生與在校生人數成長之變化 (%)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年鑑 1987-2000（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1987-2000 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鑑 200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3~14；<http://www.edu.cn/20040202/3098144.shtml>；2004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4796.htm>；2005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20434.htm>。

圖 2 1992~2006 研究生招生與在校生人數成長比例 (%)



資料來源：同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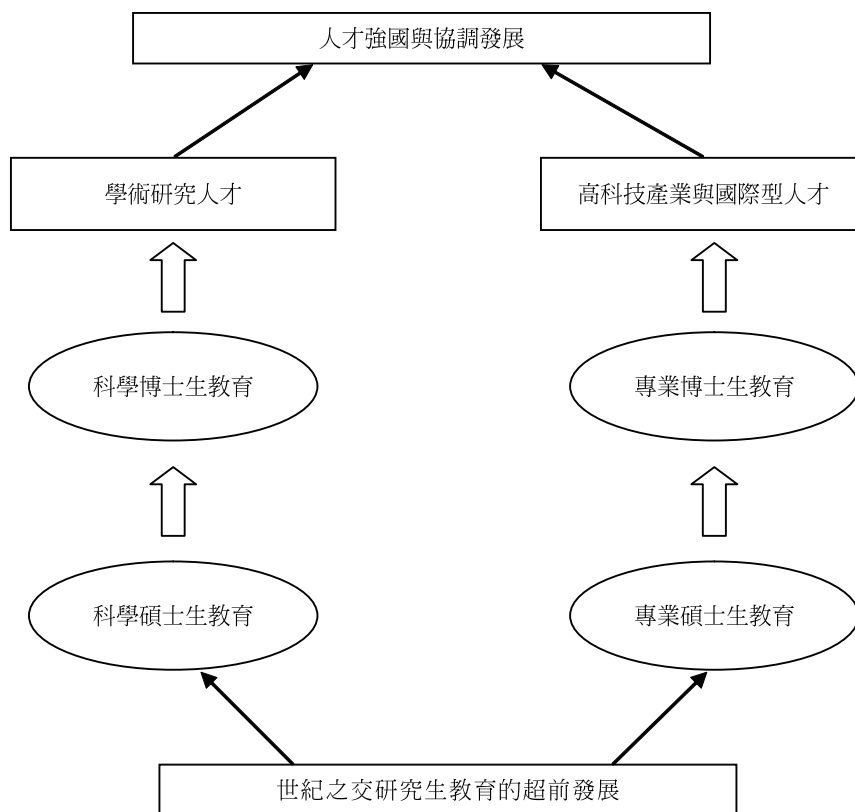
表 1 中國大陸碩士研究生招生人數、報名人數（含國家計畫、委培和自籌經費）及錄取率（2000~2005）

年份	招生人數 (萬)	成長比 (%)	報名人數 (萬)	成長比 (%)	錄取率
2000	6.5		39.2		16.6
2001	9.4	44.62	46.0	17.35	19.8
2002	15.9	69.15	62.4	35.65	25.5
2003	19.6	23.27	79.7	27.72	24.6
2004	27.49	40.26	94.5	18.57	29.1
2005	32.49	18.20	117.2	24.02	27.7

資料來源：趙東，「考研現狀及背後」，河南教育（高校版）（河南鄭州），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5。

第二個成就是確立了圖 3 的研究生教育超前發展的策略，即以「全面小康」和國家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為動力，將碩士生教育分科學學位與專業學位兩種；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學位亦開始起步，一方面為菁英大學轉型研究型大學提供研究人力，另一方面為大陸高科技發展與入世之後的發展輸送大量專業人才。

圖 3 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分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叁、與國際接軌之相關措施

如前所提，1980 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恢復之時，是延續 1950 年代蘇聯的師徒制度。此一制度恢復後不久即遭到批評，相關的改革措施於 1980 年代末開始起步，1992 年之後隨著招生人數的擴張和兩大工程的推出，加速推動。

一、專業設置的調整與教學改革

1950 年代，蘇聯體制建立時，最大的改變就是將系改變成行政單位，其下設各類專業，意思是「一行專門職業或一種專長」，每個專業各具一套具體的教學計畫。專業體制最大的缺點是將學門劃分過細，缺乏彈性。1980 年代初研究生教育體制重建時，即按專業的分類設立了 10 個學門，其下設置 63 個一級學科和 654 個二級學科，作為各大學博士、碩士點的設置，和相關課程安排的指標。由於此一劃分對於各大學限制過大，而且學位與歐美國家接軌困難，在學界多次的呼籲之下，曾先後進行了 3 次調整，至 1997 年第三次調整定案時，學科門類增至 11 個，一級學科增至 88 個，二級學科則縮減至 382 個。一級學科數量的增加和二級學科數量的消滅，給予各學門和專業較寬廣的空間，亦有助於學位和課程逐漸和國際的學門接軌^④。2002 年之後，一些菁英大學更獲授權，得在博士學位一級學科範圍內自主設置學科、專業的改革試點工作，使之得以隨大環境變化即時調整其專業。

在學制方面，經過學界多年的呼籲，碩士生需 3 年才能畢業的硬性規定終於得以解除。許多重點大學實行本科、碩士連讀和碩、博士連讀的制度。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大學更推動 8 年制的本科生、博士班連讀試點^④。一些學校將碩士生教育的年限從傳統的 3 年縮短至 2 年半，以至 2 年，也有學校從 2 年又改回 3 年。2006 年筆者訪談大陸時，已有學校改由傳統的兩學期制轉變成為 4 學期 (quarter)，以教授研究課題與經費為基礎分配教授收取研究生之名額，數所菁英大學更突破由博士生導師指導研究生的傳統，開放副教授收取博士生。

在教學方面，自 1998 年擴張之後，各大學即開始推動各項改革，2005 年教育部提出「研究生教育創新計畫」，以及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制度的啟動，帶動各大學研究生教學的改革，包括課程的多樣化與短期講座的設置、開闢網路學術沙龍，以及實施博士論文他校學者匿名審查，稱之「盲審」^⑤。

註④ 梁傳杰、羅勤、梁碧濤，「對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調整的回顧與思考」，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35-37。

註④ 章曉莉，「『考研熱』背後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江蘇工業學院學報（江蘇），第 7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59-61。

註⑤ 曹慧旻，前引書，頁 13-17。據筆者之訪談，有的院的博士論文均需經過盲審，有的院系採取抽籤的方式，並非全部論文都需盲審。

二、招生對象的多元化與碩士生收費制度的建立

在招生方面，除了統一招生考試制度，亦有單獨招生，招生的對象從全職生延伸至職生，並仿照 4 年本科生的招收，走向多元化，從最初單一的公費生，發展到招收偏遠地區的定向生，以及接受企業的委託，招收企業職工，稱之委託代培生。1990 年代中期後有類似台灣的推甄的免試生，並見同等級的大學之間互相交換免試生。教育部門認為此一方式有助於優秀生源的保障和多源化，可有效降低近親繁殖的問題，於 2003 年開始推廣，要求各大學提高交換推薦免試生的比例至 30%^④。

自 1990 年代初，學界即呼籲碩士班研究生實施收費制，此後相關的研究與論述不斷，但因顧及學生的反彈，收費政策遲遲未見推出。雖然如此，自費研究生人數持續增長，加之自費為主的專業學位快速發展，為各大學開闢新的財源。2005 年自費生的在校人數已與公費生人數相當^⑤，以至 2006 年千呼萬喚的收費制度終於推行。北大、清華、浙大、復旦、上海交大、同濟、華東師大、西安交通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 14 所大學開始試行獎助學金制度，所有學生均將繳交學費。樂觀者認為這些大學的試辦，將為研究生教育學費制度的建立，以及談論多年的研究生導師制度的改革開路^⑥。

三、合作辦學的發展與國際化

1990 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發展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合作辦學。合作辦學分學官合作、跨省合作、跨國合作 3 類，集中於菁英大學。例如廈門大學，由於其會計系全國聞名，國家會計學院設置在學校附近，以廈大校長為其副校長，聘請廈大的教授授課。跨省辦學又稱之異地辦學。1990 年代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先後在深圳建立研究生院；北京大學和國家人事部高級公務員培訓中心合作，成立杭州市幹部培訓中心，提供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專業教育。這些分校的建立出自於地方的主動邀請，受邀者亦看重地方的特質，希望能藉之建立對外的窗口。分校的學生均需繳交學費，其共同的問題是管理不易，以及母校教授不願來回奔波，影響到課程的安排與品質的維持^⑦。

註④ 萬雪玉、馬應征，「新疆校碩士研究生生源分析」，*民族教育研究*（北京），第 3 期（2007 年 6 月），頁 30~32。

註⑤ 李林、李忠，「現狀、原因及改革：研究生欠費問題探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8 期（2006 年 8 月），頁 25~30。

註⑥ 王尋，「研究生收費：改革一小步」，*中國新聞週刊*（北京），2006 年 9 月 25 日，頁 34~51；劉增輝，「研究生收費：一場小心翼翼的改革」，*教育與職業*（北京），第 31 期（2006 年 2 月），頁 40~41。

註⑦ 楊君游、林功實，「加強異地辦研究生教育管理鏈的構建」，*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2 期（2005 年 1 月），頁 32~33；刑志杰，「中國大學異地辦學的發展與問題研究」，*現代大學教育*（湖南長沙），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04~108；張虹，「異地辦研究生教育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14~16。

跨國合作辦學是國際化的一環，以英語化和高學費為其特質。1990 年代初，天津財經學首先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辦 MBA 班，此後 MBA 或 EMBA 就成為菁英大學的金母雞。不過，遲至 2003 年 3 月 1 日，國務院才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於同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次年 6 月又公布實施辦法。政策鬆綁為國際合作帶來動力。據粗略估計，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授予外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生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多達 114 個。絕大部分授予碩士學位，授予博士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只有 3 個。合作的國家中，澳大利亞以 34 個領先，美國居第 2，共 29 個，歐盟和香港，以 20 個、19 個分居第 3 和第 4（見表 2）。不過，這個新興的市場尚待規範，品質良莠不齊^⑤，其中澳洲個別教師的營利導向頗受到其他競爭者和在地的學界的批評。

表 2 中國大陸授予研究生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的國家和地區情況

國別和地區	美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	香港	歐盟	挪威	新加坡	韓國
中外合作辦學數量	29	34	8	19	20	2	2	1

資料來源：鍾敬玲、吳松，「中外合作辦學與研究生教育國際化」，中國研究生（北京），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22。

除了專業分類的鬆綁在於與國際研究生教育接軌，其他如學生種類多元化，或是辦學模式多元化最大的效益在於研究生人數的擴張和大學財源的拓展。

肆、傳統國家控制模式：在重點與均衡發展之間求取平衡

如前所提，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基本上仍是依循傳統的國家規劃與控制。這個傳統於 1950 年代至 1964 年基本上是採取以區域發展均衡為主，重點發展為輔的路線。至 1980 年代，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論以後，轉變成以重點發展為主，均衡發展為次的策略。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大陸地區差距快速擴大，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了「全民小康」作為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全民小康」以「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協調發展為其基本精神，先後推出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政策。但是與之同時推出的另一個重要訴求是透過高科技的發展在最短的時期內，追趕歐美國家的「跨越式發展」（或高發展模式），而高等教育發展的任務是為此一政策的落實提供高層次專業人才，因此其策是持續以重點發展為主，均衡發展為次的策略，並由之而建構了一個新的金字塔^⑥。就研

註⑤ 心怡，「中外合作辦學面面觀」，中國研究生（北京），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18-19。

註⑥ 有關此分析，請參閱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頁 119-136、209-234。

究生教育方面，此一特質見於以下三方面。

一、重中之重發展策略的確立

重點發展的政策是建立於 195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國有化制度改造完成之後，至 1950 年代末因兩條腿發展策略的推動，得以確立，1965 年之後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爲批判的目標而廢止，於 1980 年代初不僅再度復活，而且還出現了「重中之重」的發展策略。「重中之重」的發展策略是立基於「集中財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信念上^⑤，其基本的特質就是在重點大學中再挑選出數所或十幾所大學，予以專案經費的支助並給予其較大的自主空間，幫助其快速發展，以成爲其他大學的「領頭羊」^⑥。此一策略的重心就在研究生教育的發展，主要包括 4 項重點指標的建立：碩士點學位、博士點學位、研究生院、重點學科的設置。

1990 年代，「211 工程」、「985 工程」的推出將重中之重的發展策略與世界高等教育追求卓越的潮流相結合。由於 1990 年代之後碩士、博士點設置的權力逐漸下放給學校和地方政府，碩、博士點原所擁有的指標性特質隨著數量的增長而弱化，至 2006 年，博士授權的學校達 200 多所，擁有碩士授權學校 400 多所^⑦。兩大工程的發展主要以研究生院和重點學科的設置爲指標，又以重點學科的設置最重要。以下分別述之。

(一)「211 工程」、「985 工程」內涵的確立

「211 工程」於 1992 年推出後，經過 3 年的調整，至 1995 年確定目標爲建設「一批高校和重點學科點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其數量多達百所，與 1950 年代的重點大學同等性質，不同的是以重點學科發展爲導向。1998 年 5 月啓動的「985 工程」則是規劃重中之重的菁英大學，並將之劃分爲兩類：一組是以創建具有世界一流大學水平爲目標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其餘是教育部、省（直轄市）和地方或是有關部門重點共建的學校。兩組至今共 38 所，其共同的目標就是以發展研究生教育爲第一優先，致力提高研究生與本科生之比例。2002 年，全國重點學科評選、「211 工程」和「985 工程」進入第二期的建設。「211 工程」的學校配合國家第十個五年（「十五」）經濟建設計畫，持續以學科建設爲主線，並以重點學科項目爲核心，進行細部規劃^⑧。「985 工程」的學校也是以發展重點學科爲主軸，致力於提高學校整體的水平，強調師資結構

註⑤ 鄭永流，「學術自由及其敵人：審批學術、等級學術」，*學術界*（安徽合肥），第 104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78-186。

註⑥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頁 210-230。

註⑦ 楊衛，「研究生教育：通向教育強國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5 年 7 月 7 日，<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2964.htm>。

註⑧ 張波、方耀楣，「正確處理『211 工程』建設中的若干關係」，*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0 期（2002 年 10 月），頁 21-24。

的優化、國際化，以及科技創新平台的建立，以及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聯結⁵⁶。

(二) 研究生院的發展與分類

1984 年 8 月，北京大學等 22 所大學獲准試辦研究生院，1986 年協和醫科大學等 10 所院校加入，結合中國科學院體系之下的中國科技大學，總共為 33 所研究生院。設置研究生院的重大意義在於高等教育機構分層，將之與未獲准的大學只能設置研究生處相區隔。獲得試辦研究生院的 33 所大學不但是碩、博士生教育發展的重心，與中國科學院旗下的實驗室競爭經費，並成為接續推出的博士後流動、國家重點實驗室、重點學科發展的基地⁵⁷，以及 1986 年之後推動科技發展的主要執行機構⁵⁸。至 1993 年，33 所研究生院的博、碩士在學人數分別占全國的 54.4%與 41.9%，在與學術研究發展至關重要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後流動站等數量方面，高達 68%以上。

經過 10 年的發展，研究生院在大學組織架構的定位於「211 工程」推動重點學科之後方得確立⁵⁹。1995 年 10 月《研究生院設置暫行規定》頒佈，對於研究生院的條件、職能與組織機構予以規範；同年研究生院評鑑亦開始進行。1999 年之後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同步快速擴張。後者以舒緩升學教育競爭、高等教育大眾化為最終目標，並以高等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層的地方大學、專科學校，以及新興的二級學院為基地⁶⁰。研究生教育的擴張則是在以金字塔頂層具有研究生院的菁英大學為主體⁶¹。

2000 年 6 月，北方交通大學等 22 所高校獲准試辦研究生院，2002 年 5 月，哈爾濱工程大學等 2 所獲准試辦，研究生院數量增至 57 所，其中包括 3 所軍系的大學⁶²。研究生院設置的最大效應就是激起大學之間的競爭，現今中國大陸的菁英大學可分三

註⁵⁶ 「教育部、財政部關於繼續實施“985 工程”建設專案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4 年 6 月 2 日，<http://www.moe.gov.cn>。

註⁵⁷ 楊致錄、薛迪生、朱征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設立高校面臨的形勢及對策」，*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7 期（1987 年 4 月），頁 44-46；劉文達，「應重視和加強高等學校的基礎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11 期（1987 年 4 月），頁 30-31。

註⁵⁸ 王樹生，「輝煌 863—哈爾濱工業大學承擔 863 計畫 15 週年回顧」，*國防科技工業*（北京），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49。

註⁵⁹ 葉紹梁、廖文武，「對高校研究生院建設中若干基本關係的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43-48；齊欣，「研究生院建設的若干問題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3 期（1998 年 3 月），頁 48-50；薛靜、陳洪根、張駿，「研究生院核心競爭力及其提升途徑研究」，*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 2 期（2004 年），頁 23-25。

註⁶⁰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頁 210-230。

註⁶¹ 郭新立，「從大學功能累積分佈規律看高等教育重點建設」，*中國高等教育*，第 19 期（2003 年 10 月），頁 16。

註⁶² 「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組織機構」，*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檢索日期 2007 年 5 月 31 日，<http://www.acgs.pku.edu.cn/zuzhijigou.html#d>。

個層次：擁有「正式研究生院」之院校、「試辦研究生院」之院校，以及一些積極申請「擬試辦研究生院」之院校，充分體現了分層次辦學的特質。

（三）重點學科的建設與發展

重點學科之設置始於 1980 年代中期。依大陸一位受訪學者的解釋，此一政策是立基於「不要將雞蛋全部放在一個籃子當中」的理念。設置之初，僅止於各大學學位授權點（博士點和碩士點）的申辦規劃，直到 1995 年「『211』工程總體建設規劃」以之為發展重心之後，才得以快速發展^⑥，其內涵亦不斷擴展。現今重點學科的發展，包括特定的學科基地建設、相關研究人才的培育和發展，以及優越的學術研究產出，其目的一如昔日研究生院的角色，就是發揮示範性、「火車頭」作用，以及凝聚力的功效^⑦，成為過去十年各大學發展自我特色的主要動力。重點學科建設有 3 項重要措施，每一項都有等級的劃分：

1. 學科的分級

如前所析，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教育是以學科的分類和分級為指標。除了學門的功能在於分類，學科一級和二級的設定兼具分類和分級的功能。2002 年之後，一些菁英大學獲得在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範圍內自主設置學科、專業的改革試點工作，同時也可在獲得授權的學科之下所有二級科博士學位的授予權。未獲試點的學校，每一個二級學科的設置仍得經過層層的審批。由之擠入一級學科自主名單成為各大學和各系所努力的目標。

2. 重點學科的評定

重點學科的評選於 1987 年開始進行。學科評選有的是由上而下，由中央按國家發展政策和各校的特點挑選，也有的是由下而上，就是由各大學以自己的長處為基礎，建立和發展校級重點學科，再與其他院校競爭，進入國家重點學科發展的名單。一旦選入，不但成為各校改革與發展的動力，而且在各自學門中扮演「龍頭」的角色^⑧。2001 年共評出 964 個重點學科，含蓋 183 所高等學校^⑨。此後，重點學科的數量成為衡量一所大學在全國大學中的地位 and 影響力的指標^⑩。

註⑥ 傅斌，「關於『211 工程』重點學科建設的思考」，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2 期（1996 年 1 月），頁 12~13；「必須實事求是地建設『211 工程』」，瞭望新聞週刊（北京），1995 年 11 月，頁 7。

註⑦ 季劍平、席與亨、徐玉良、陳善忠，「高校科研管理學科建設管理協調與運作機制」，科技創業月刊（湖北武漢），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95~96。

註⑧ 張慧淵、徐樅巍，「關於高等學校學科建設規劃若干問題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5 期（2003 年 5 月），頁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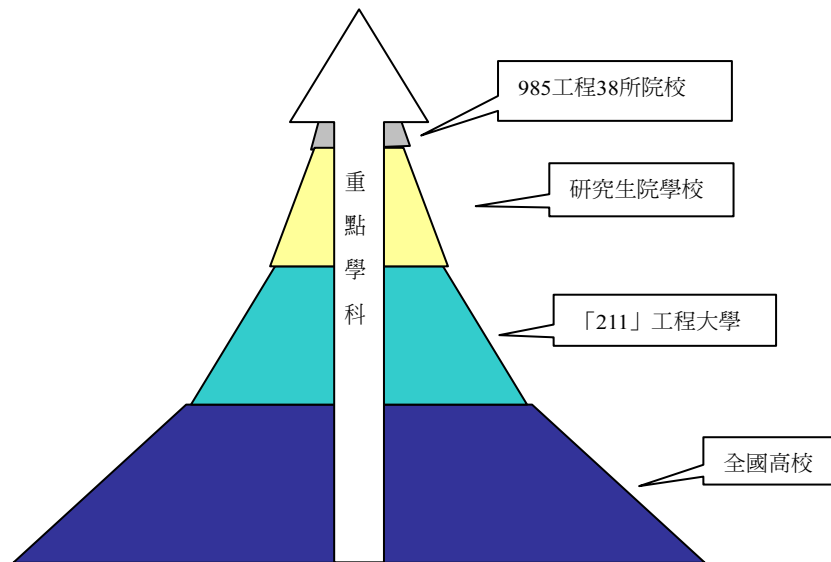
註⑨ 郭新立，「以重點建設帶動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2~5。

註⑩ 李濤，「高校重點學科評估的內涵、實施步驟和意義」，大同醫學專科學校學報（山西大同），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43~45。

3. 學科評估

評估就是評鑑。1995 年學科建設政策推出的同時，學科評鑑亦展開。學科評鑑是以各大學同一學門的設備、師資、學術聲望、研究成果、經費為主要指標，對於各大學不同學門進行評比。1990 年代陸續有 3 個不同單位曾進行 4 類不同的評鑑，最受關注的應是國家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所作的評比和排序。這個專屬於研究生教育的評鑑與本科 4 年的專業教學評鑑平行，不過由於其並未強制各校加入，因此影響力仍然有限。除了排名和評鑑，還有另外兩類體系：各項大型計畫的期中合格評估、研究計畫的評選。由於研究計畫具有強烈的國家政策導向，並由國家之主管部門主導，極具指標性，競爭亦相當激烈^⑧。

圖 4 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金字塔之建構



資料來源：郭新立，「以重點建設帶動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3。

以上之政策不但成為中國大陸各大學發展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動力，而且逐一走向制度化。其中，重點學科的入選不僅攸關各大學博、碩士學位點的增設、資源的獲取，而且是現今各項評鑑的主要指標之一，其數量的增長成為各層級大學改變現況的第一要務：如由專科升格大學，大學爭取研究生學位授予權，普通大學升格為重點院校，地方大學升格國內知名大學，菁英大學爭取世界一流^⑨。負責「211 工程」的教育

註^⑧ 朱允衛、易開剛，「目前我國一級學科評估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 12 期（2004 年 12 月），頁 28-30。

註^⑨ 張純成，「學科評估中的誤區與矯正」，*自然辯證法通訊*（北京），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11。

官員郭新立曾以學科建設為主幹，製作金字塔架構圖（圖 4）：最上層是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以及 36 所（當時為 34 所）共建大學，第 2 層是設有研究生院的大學，第 3 層是近百所進入「211 工程」。最後，在最底層的是一般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此一分類與現今眾多學者將中國大陸前百所大學分成 3 種不同類型的研究型大學相呼應。

二、均衡發展的措施

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各地區人文與地理資源差異甚大，均衡發展政策是中國大陸國家總體發展政策中主要的一環，在 1950 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還是政治鬥爭的利器。儘管 1980 年代之後，均衡發展的考量因素降為次要，在實施重中之重發展策略的同時，照顧弱勢地區的措施不曾間斷，並於 1995 年之後，藉著西部大開發等政策而強化。2003 年胡錦濤繼任國家領導人之後，以「五個統籌」論取代了先前的「跨越式發展」，並以統籌城、鄉協調和區域發展的協調為優先^⑦，有關弱勢地區的措施亦相應更新和擴大，以下簡略述之：

（一）招收定向生、委託代培生

1980 年代，研究生院集中於東部地區，邊遠地區的條件不足，主要透過定向招生，送學生至他省的大學或研究生院就讀，稱之移地培育^⑧。1987 年，內蒙古、新疆等邊遠 8 省率先試行招收定向生。1989 年，前國家教育委員會更要求所有設研究生院和未設研究生院的高校在當年的碩士班新生中，定向生的比例需達到 30% 至 40%；未達成之院校的第 2 年招生計畫人數將遭到裁減^⑨。十多年之後，也就是 2005 年，一項名為「培養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幹人才計畫的實施方案」推出，仍然採取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定向就業的模式，以統一考試、單獨劃定錄取分數標準的方式進行招生。非在職生的比例要占其總數的 50% 以上。被錄取的少數民族碩士研究生需集中上課一年，稱之基礎培訓，以加強英文、漢語、計算機、高等數學等能力。其名額從 2006 年的 2500 人倍增至 5000 人，根據出爐未久的文件，2008 年的人數縮減至 4200 人，並且開放其中 10% 招收漢族考生（見表 3）。

（二）推動對口支援

重點大學有兩個任務：一是前者所提的豎立榜樣，帶動改革；另一個就是扶助和支援弱校和弱勢地區，稱之對口支援。1990 年代中後期，西部大開發工程推動之後，

註⑦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前引文。

註⑧ 薛天祥、楊曉江，「走向 21 世紀的研究生教育」，*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6 期（1997 年 6 月），頁 53。

註⑨ 文冬梅、宋鐵波、盤芝明，「淺談定向研究生在畢業派遣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 期（1994 年 1 月），頁 14-15。

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在內的 13 所名校，分別被指派對口支援新疆、貴州、雲南等 13 所大學，進行教師培訓、碩、博士學位的攻讀、並支援所在地區相關的科學研究^⑦。

表 3 少數民族研究生定向招生之人數 (2006-2008)

單位：人

年	招生規模	碩士生	博士生
2006	2500	2000	500
2007	5000	4000	1000
2008	4200	3400	800

資料來源：1.「教育部等五部委關於印發《培養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幹人才計畫的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6 年第 15 號，頁 30~32。

2.「教育部辦公廳關於下達 2008 年『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幹人才』研究生招生計畫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 年 9 月 20 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179.htm>。（教民廳〔2007〕6 號）。

(三) 劃分考區

長久以來，邊遠地區的考生享有降分錄取的優惠待遇。2000 年之後，為鼓勵人才回流西北地區，碩士入學錄取作業中的優待對象又增設以下之考生：(1) 願赴西部大學讀研究所，(2) 畢業後願回原單位工作的西部在職生，(3) 具邊遠地區、少數民族背景和一些特殊專業考生^⑧。發展至今，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試劃分成 3 個考區，並按之將考生分成以下 A、B、C 三類。

一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 18 省(市)。報考這些地區的考生屬於 A 類。

二區：重慶、四川、陝西 3 省(市)；報考這些地區的考生屬於 B 類。

三區：內蒙古、廣西、海南、貴州、雲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10 省(區)。報考該區者為 C 類考生；目前在三區工作且定向或委託培養回原單位的考生。報考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考生以及少數民族考生，以及礦業、地質等 11 個冷門專業的招生，均獲得優待政策^⑨。此外，西部地區亦在政策的支持之下，與 33 所菁英大學一樣，以招收公費生為主體^⑩。

註⑦ 王瑞琦，「從市場機制的發展看西部大開發中人力資本投資的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 (2002 年 5 月)，頁 1~25。

註⑧ 同前註。

註⑨ 焦新，「今年研究生招生體現四大特點」，中國教育報(北京)，2005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註⑩ 李林、李忠，前引文，頁 25~30。

(四) 納入區域平衡的考量因素

循其傳統，自 1980 年代迄今，不論是研究生院、碩士點、博士點、重點學科設置，以至 16 類的專業學位的設置，地區分布都是主要的考量因素。胡宇芳的研究指出，2001 年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初設時，首批獲准試點 24 所學校俱為管理方面的菁英大學，地區分佈考量因素為次，西部僅有西安交通大學。至 2004 年，新增加的 23 所就納入了蘭州大學、內蒙古大學、新疆大學、雲南大學，以及山西大學等內陸省分^⑦。

以上之政策與近幾年擴大招生對於偏遠的省或是自治區的研究生教育產生積極的效應。根據萬雪玉和馬應征的研究，文革結束後 20 多年，新疆各大學因缺乏生源，只能仰賴自己學校的本科畢業生。2000 年之後，各校的碩士生在校人數開始躍增，而且因招收大批內地大學畢業生，生源結構多元化，有益於化解長久以來近親繁殖的問題^⑧。

伍、未來研究生教育治理之挑戰

自研究生教育擺脫悲情之後，其發展受到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界研究者的關注，至新世紀初已有自己的研究群體。如前所提，2003 年胡錦濤為國家領導者之後，提出「五個統籌」論。「五個統籌」論雖不再強調跨越式發展，但是保留了江澤民「全民小康」政策口號中的「協調發展」，並以為主要訴求，就是以國家之力量，求取以下 5 個層面的協調發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之間^⑨。此一訴求成為眾多大陸教育學界分析研究生教育發展的起點，而其論述大致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有關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內涵，諸如入學考試、課程的多元化、各學科發展、學生就業市場，以至學費制度設計等。這些論述多以現今歐美研究生教育的理念為基礎，與前述全球化潮流並進。另一類的論述則是關乎制度之永續發展，除了傳統的區域發展差距問題，亦見新的議題，例如擴張之後大學的趨同性發展、教育公平性，以及行政管理與學術之間關係調整等。從這些議題的分析，可以看到前述傳統國家角色與發展策略、新建的金字塔模式所面對的挑戰，其大致可分行政管理體制與均衡發展兩個層面。

註⑦ 關於 MPA 的發展，請參閱胡宇芳，「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人才強國』策略之分析：從高等教育區域發展差異的角度觀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92-96。

註⑧ 萬雪玉、馬應征，前引文，頁 30-32。

註⑨ 謝伏瞻，「五個統籌是新的改革觀和發展觀」，中國經濟時報（北京），2003 年 11 月 21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446779.htm>。

一、在行政管理體制方面

根據中國大陸本土文獻與筆者之訪談，新世紀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在管理體制上面對了來自三方面的挑戰：

(一) 國家、大學、地方之間的協調

儘管過去 10 年，多項政策鬆綁，但是學界、地方均期待更多放權。他們指出，學位的授予、學科專業設置、學位證書發放，以至研究生招生的人數和招生考試，其實仍然由中央控管。據學者鄭永流分析^⑩，多年來各項重大工程：如「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屬教育部主管，「973 計畫」屬科技部，「專業人員資助計畫」屬人事部。各工程之篩選是透過這些部門的負責單位，結合少數由政府挑選出來的資深評審委員進行審批完成。此一中央集中管理的模式主要的問題之一是難免於惡性競爭，例如前述的學術審批制度就導致各項工程或計畫走向行政組織化和官僚化，加之眾多透過專案的補貼缺乏透明程序，不僅誘使各大學的主管投入精力和財力於關係網絡的建立上，以確保申請過程的順利，同時亦令負責計畫的學者謹言慎行，以防節外生枝^⑪。其次是中央控管的難度隨著研究生人數規模快速增長不斷提高。一方面，大學需要更多的施展空間，以便在日趨激烈的教育和學術市場競爭中獲取優勢。另一方面，擴大招生之後，承擔教育經費的地方政府亦需要更多的自主空間，以應地方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布局等的需求^⑫。

近年，由於地方大學碩士生入學考試弊病甚多，中央以保障品質為理由，決定將碩士生入學考試中，各校自行命題的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合併成專業基礎綜合科目，並與政治理論、外語一同納入統一考試^⑬。以上中央的干預與學界所期待的更多的權力下放背道而馳。

(二) 校園行政管理機構之間職權的協調

承其傳統，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主要是由一級單位的研究生院或研究生處掌握，而其功能和職能隨著各項工程不斷擴大，從學生招生、畢業就業、教育教學、科學研究、組織人事、總務後勤，在一些學校還包括財務預決算和學科建設等^⑭。因此，儘管

註⑩ 鄭永流，前引文，頁 178~186。

註⑪ 同前註。

註⑫ 高桂娟、朱佳麗，「從治理角度看我國學位管理體制的改革」，*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湖北武漢），第 2 期（2007 年 4 月），頁 112~115。

註⑬ 張永澤、岳志偉、余伯陽、于鋒，「淺議我國研究生招生考試初試科目『四改三』的必要性」，*中國高等醫學教育*（浙江杭州），第 6 期（2007 年 6 月），頁 5~7。

註⑭ 秦發蘭、汪華、彭彬、胡承孝，「實施校院兩級管理，推進研究生教育管理創新」，*高等農業教育*（遼寧瀋陽），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63~65。

學生招收是以各校碩士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的專業為基準，但是收取學生人數的多寡不在個別老師，而在招生辦公室。根據筆者多次訪談，1999 年碩士班研究生擴大招生之後，專業學位的種類不斷增加，教授們深為招收學生太多，每天忙於學生的開題和答辯所苦。對此，一位行政人員的回應是，擴招是國家政策，必需落實，指出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變碩士生進行學術研究的傳統。

從相關之文獻可以看到，隨著研究生教育的高速擴張，作為管家婆的研究生院的確是不勝負荷^⑤，而近年，一些大學的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職責也不斷擴大，從最初評定研究生學位，延伸至審批博士生導師，自行審批和調整碩士點^⑥。在新世紀，研究生院的職掌應如何重新調整？其與作為二級管理機構的各學院之間的職權又應如何劃分？學位評定委員會作為學術權力機構究竟應為研究生院內的機構，還是超越研究生院？以及如何發揮各院教授的學術職能？這些有關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之間關係調整隨著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的國際化日趨緊迫，也等待著國家政策的引導。

（三）學術權力和資源分享之協調

如前所提，過去 10 年重中之重發展策略形成了研究生教育金字塔發展模式，不過，與這個金字塔架構同步出現的是大學校園和學術界等級文化。現今，在學生群體中有公費和自費之劃分。在教師中有院士教授、學科評議組成員、博士生導師（通稱「博導」）、碩士生導師（通稱「碩導」）、和一般無資格收研究生的教師等數個層級。至於研究生院，本身不但有 3 種等級之分，還按是否擁有一級學科自主設置、擁有重點學科，以及擁有博士、碩士學位授權等劃分。與這些等級相搭配的是不同等級的獎勵機制（包括國家級、省部級、校院系級），以及學術期刊的分級，如權威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科學、法學研究）、核心期刊（如各綜合性大學的學報）、一般期刊^⑦。質言之，現今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教育實是一個由各種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所結合而成的一個大金字塔。

以上之等級劃分，本身並無不當，但是當其與資源、權力的獲取和擴張緊密相連時，就形成了近年大學校園「官本位」的現象^⑧。根據筆者之訪談，由於上述等級的差異與權力和職位直接掛鉤，導致學校的資源集中於行政主管，促使教授們積極於行政職務的爭取，擠入所謂「雙肩挑」的教授行列。此一管理職位與學術資源分配的結合

註⑤ 趙小芳，「高校研究生管理制度改革與院系學術權力的發揮」，*理工高教研究*（湖北武漢），第 25 卷第 3 期（2006 年 6 月），頁 36-37；周孜、周留根，「應對農科博士生擴招帶來的壓力的措施探討」，*高等農業教育*（遼寧瀋陽），第 12 期（2003 年 12 月），頁 73-75。

註⑥ 葉紹梁、廖文武，前引文，頁 43-48。

註⑦ 鄭永流，前引文，頁 178-186。

註⑧ 李碩豪，「我國大學存在的幾個悖理現象」，*高教探索*（廣州），第 3 期（1999 年 6 月），頁 47-49；楊振寅、鄧廣、劉新立，「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3 期（2003 年 6 月），頁 101-107。

頗受到批評。學者指出，學術權力和資源過度集中，不僅抑制了基層聲音的上達和年輕教師對外聯繫和接觸的機會，並因近親繁殖的傳統特質，易形成學霸與學閥⁹⁸。

二、關於均衡發展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協調

隨著高等教育與國際潮流接軌的發展，新世紀初，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內涵，除了傳統的區域發展均衡，還添加了兩個新的課題：市場需求和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的擴張。

（一）區域發展均衡

觀諸前述分析，1990 年代中後期，尤其是近幾年，中央對於邊遠地區的研究生教育發展投入不少心力，但是菁英與偏遠地區的差異似乎有增無減。對此，中央的金字塔發展策略是一個主要因素。

與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的研究生教育有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新金字塔的發展不再依循傳統的平頭主義，而是以放權與多元化發展為基礎。這使得頂層的菁英大學在招生、設置二級學科與碩、博士點等設置均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其教師為各項國家級人才工程中的主要受惠者，導致其與一般大學研究生教育之間的差距急遽擴大。另一方面，各項評鑑指標是由國家統一制定，並以菁英大學為依歸，促成大學的趨同性發展，使得地方大學和偏遠地區的弱勢更為突顯。

1. 地方大學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困境

一般大學，尤其是地方大學的研究生教育的劣勢可見於以下幾方面。首先，在定位上，因以為地方培育高層次人才為主旨，在國家總體發展政策中，以及 1990 年代後期的擴張政策中，分量極微，以至於在圖 4 的發展架構中，找不到適當的位置。研究者指出，地方大學的研究生教育至今在組織架構上，只能設置研究生處，甚至付之闕如，缺乏菁英大學的獨立性與自由度，常受地方政策與其他行政單位的牽制⁹⁹。其次，在資源爭取上，缺乏競爭優勢，能夠擠入「211 工程」或是獲准設置重點學科者鳳毛麟角，難以建立和發展自己的特色，被迫追隨潮流¹⁰⁰。根據張應春、丁毅強¹⁰¹，2000 年中國大陸大學研究生培養單位，不含軍事院校，共 415 所，其中地方大學 314 所，約占

註⁹⁸ 顧海兵，「對我國學術管理制度改革的諫言」，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21 期（2003 年 11 月），頁 29-31。

註⁹⁹ 汪曉唯、陳濤，「淺論一流省屬綜合性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機構建設」，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湖北宜昌），第 26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6-88。

註¹⁰⁰ 李純青、馮江紅，「非重點院校研究生教育學科建設的思考」，河南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職業教育版）（河南新鄉），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85-86。

註¹⁰¹ 張應春、丁毅強，「試談地方高校發展研究生教育之策略」，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7 期（2003 年 7 月），頁 30-31。

總數的 76%。但是在 2001 年研究生招生中，地方大學碩士生招生 41,632 人，約占碩士新生總人數的 34%，博士生招生規模為 4,334 人，占總數的 15%，地方大學研究生教育招生單位多、規模小的特點，亟待突破。然而，客觀環境的侷限，令其提供基本水平的研究生教育都感到吃力，尤其在近幾年高等教育分工的潮流之中，更是找不到改革與創新的動力和空間。

2. 偏遠地區發展遲緩

如前所提，1980 年代，研究生院集中於東部地區，邊遠、落後地區和冷門行業主要仰賴國家政策的支持和菁英大學的支助，卻也因此後者研究生教育發展遲緩^③。1990 年代，各地區開始建立自己的研究生教育體系，至 1995 年 8 個邊遠後進省區占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只有 10 多個博士點與 300 個左右碩士點，占當時全國 2400 多個博士點與近 8400 個碩士點，分別只有 0.05%與 3%^④。表 4 是有關 2002 年的碩士學位授予單位與授權點的地區分佈，東部佔了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中部、西部都在 20%左右。表 5 有關研究生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地域分布，地區發展差距就更明顯，北京、上海兩市和江浙地區就佔了全國的 67.52%。

表 4 中國大陸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碩士學位授權點統計表（截至 2002 年 6 月）

	碩士學位授予單位數	占全國的比例 (%)	碩士學位授權點數	占全國的比例 (%)
東部	415	57.16	4848	50.02
中部	148	20.39	2602	26.84
西部	163	22.45	2243	23.14
總計	726	100.00	9693	100.00

資料來源：王根順、焦煒，「21 世紀我國研究生教育學科點佈局的戰略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5。

表 5 授予研究生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地域分布情況

省區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浙地區	東北地區	江西	湖北	廣東	西部地區
合作辦學數量	37	26	8	14	7	6	4	4	8

資料來源：鍾敬玲、吳松，「中外合作辦學與研究生教育國際化」，頁 22。

除了國家重中之重的發展策略，就業市場的潮流和需求是導致地方和偏遠地區研究生教育發展相對弱勢的另一個主要因素。

3. 市場需求與地區分佈的失衡

如前所提，1993 年市場經濟起步之後，由於中國大陸就業市場走向高學歷，碩士

註 ③ 殷亞利、任翠，「定向招收碩士生的體制與改革」，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6 期（1994 年 6 月），頁 12~14。

註 ④ 林祥任，「後進省（區）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 期（1995 年 1 月），頁 63。

學歷逐漸取代 4 年本科教育成爲青年學子取得大城市戶籍，留在大城市、轉換工作的主要途徑。當時研究所畢業生仍然稀缺，各院校的畢業生均得以留在大城市，博士生進入大學執教或是進行博士後研究，都相對容易。但是這個好景隨著研究生人數的擴張和就業市場競爭激烈而逐漸消失。新世紀初，研究生的就業市場競爭中有兩個重要指標：第一是學校的名聲和位置（大城市），第二是專業，符合了媒體報導所言「大家都想到重點高校讀研，在大城市工作」^⑤。這對於偏遠地區或地方學校，以及冷門專業的研究生教育的發展，都是一項挑戰。

表 6 2004 年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之統計

單位：人

	最多的10所大學		最多的10個省市		最多的10個專業	
1	武漢大學	21,513	北京	171,311	工商管理碩士專業學位	35,777
2	北京大學	19,766	上海	84,611	計算機應用技術	35,510
3	浙江大學	17,445	江蘇	77,961	法律碩士專業學位	34,899
4	復旦大學	17,001	湖北	71,806	企業管理	23,641
5	中山大學	16,811	陝西	49,532	金融學	19,902
6	清華大學	15,384	遼寧	47,676	通信與信息系統	19,048
7	中國人民大學	14,840	山東	43,948	外科學	18,551
8	山東大學	14,729	廣東	42,679	內科學	17,504
9	吉林大學	14,557	四川	40,913	英語文學	16,318
10	四川大學	14,547	湖南	30,791	會計學	15,306
	總計	661,228		166,593		236,456
	比例	(70.0%)		(17.6%)		(25.0%)

資料來源：原春琳，「北大清華碩士生報考數持續走高——近兩萬人報北大 1.5 萬餘人報清華熱門專業依舊 MBA 報名人數減少」，*中國青年報*（北京），2005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

自研究生擴張之後，熱門專業與冷門專業之間的強烈對比一直是媒體報導的焦點^⑥。根據表 6 有關 2004 年高達 94.5 萬名碩士研究生結構之分析，前 10 所重點大學的考生占考生總數的 70%。北京大學的報考人數爲 19,767 人，比前一年增加 1,200 多人；清華大學爲 15,383 人，增加 3,000 多人^⑦。相較之下，地區的分佈的差距就不是那麼突出。以新疆的大學爲例，其尙可以熱門專業與中央政府所給予的優惠政策吸引他省的考生，但是冷門專業就難有進展^⑧。事實上，由於競爭激烈，自 1990 年代中期，原本旨在扶助弱勢地區的定向與委培二類招生就一直是一些具有資源的學生擠入碩士

註⑤ 劉萬永，「考研人數增幅爲何回落」，*中國青年報*（北京），2003 年 12 月 9 日，第 5 版。

註⑥ 晏揚，「冷看“考研熱”」，*文匯報*（上海），2005 年 1 月 27 日，引自 Wisenews 資料庫。

註⑦ 原春琳，「北大清華碩士生報考數持續走高——近兩萬人報北大 1.5 萬餘人報清華熱門專業依舊 MBA 報名人數減少」，*中國青年報*（北京），2005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

註⑧ 萬雪玉、馬應征，前引文，頁 30-32。

教育窄門的捷徑。同樣的，特殊考生之優待等措施亦存在著相當的侷限性，能否發揮均衡之效益亦受質疑。教育消費者的需求不僅使得優惠政策的功效大打折扣，甚至扭曲，成為國家政策規劃者一項挑戰。

（二）教育公平之爭論

教育公平的議題於 1999 年代初市場經濟開展而浮現，並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和市場化不斷加溫，至新世紀初已成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領域。就研究生教育而言，其內容從前述的區域發展均衡，延伸至校園內教育資源的分配，諸如各分校的學生繳交學費，卻不能享有母校同樣品質的教育，以及合作辦學品質良莠不齊和商業取向。近幾年，最受關注的莫過於研究生的學費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校園就存在著一些西方大學所未見到的差異待遇。例如公費生不僅學費全免，每月還領基本生活費，自費生每年卻負擔人民幣 1 萬，3 年 3 萬元學費的懸殊差異。而自費與公費待遇的劃分是以學生入學考試分數高低為依據，因此考生可因一分之差變成公費生或是自費生。這些差異待遇，因立基於入學考試分數，被視為當然，但是至新世紀初，隨著歐美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的引入遭到挑戰，成為討論的焦點。研究指出，自費生不滿於與公費生的差異，拖欠學費不繳，成為一些招收自費生為主的學校管理上的負擔⁹⁹。同樣的，菁英大學在異地建立的研究生院，因其師資和教學品質與母校的差異，也受到學子們的關注¹⁰⁰。

如前提及，自 1990 年代末研究生教育公費、自費並軌，全面收費的呼聲不斷，教育當局亦一再強調全面收費，而且，以現今自費生人數已占研究生總數的一半的角度考量，實施全面收費制理當不會造成太大衝擊，但是遲至今年才開始試點，主要有 3 個因素。其一，大學生貸款制度推動以來一直存在諸多障礙，使得龐大數量貧困生的問題和弱勢族群的需求一直未能妥善解決。同樣，研究生獎助體制實施多年，亦存在諸多問題，加之特定專業學位，如 MBA、EMBA 等碩士專業學位的學費令人咋舌，令學界擔心一旦政策鬆綁是否會產生同樣的現象，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問題惡化。其二，各個專業的市場需求和成本不同，各校的條件也不同，實施一費制固然不宜，但是多元化的標準要如何制定亦挑戰決策者的智慧¹⁰¹。其三，儘管研究所招生考試競爭激烈，冷門科系依舊是門可羅雀，學費政策全面實施之後，這些科系，包括仰賴國家支助，以公費生為主的西部大學如何因應和活存？另一方面，全面收費對於困擾眾多院校研究生拖欠學費問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亦難預測¹⁰²。為此，前述 10 所菁英大學試行

註⁹⁹ 李林、李忠，前引文，頁 25~30；華鶴霞、陶美重，「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擔當議」，*教書育人*（哈爾濱），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13。

註¹⁰⁰ 張虹，前引文，頁 14~16；楊君游、林功實，前引文，頁 32~33。

註¹⁰¹ 華鶴霞、陶美重，前引文，頁 12~13。

註¹⁰² 盧曉東，「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費定價與資助政策研究報告—基於多因素市場決定論的院校個案」，*復旦教育論壇*（上海），第 6 卷第 1 期（2003 年 2 月），頁 18~34；周孜、周留根，前引文，頁 73~75。

學費制度再度掀起有關教育公平的論戰，收費制的發展與成效值得密切觀察。

伍、總 結

現今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教育起於 1950 年代中期，於 1980 年代初 4 年的本科生教育分流，重建自己的體系，但是發展遲緩。1992 年之後，市場經濟政策推動，就業市場轉以專業和學歷為取向，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重心從推動現代化轉向與國際潮流接軌，為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帶來了轉機，其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不但高速發展，而且走向多元化，以至今日不但其學生人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 2，而且與國際潮流接軌，成為各大學國際化的先鋒。

從本文之分析可看到，1990 年代中期之後至今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與轉型是透過國際潮流的引進與本土傳統的發展規劃而成。與國際潮流方面有關的包括以人力資源發展取代 1980 年代的「摸著石頭過河」做為發展的動力，以追求卓越和世界一流為訴求，推出「211 工程」、「985 工程」，以及引進並發展專業學位。搭配這些政策的是一系列的鬆綁措施，帶動研究生學制、學生種類、教學，以至辦學模式等均走向多元化。

至於本土傳統的發展規劃則是採取以菁英為主，兼顧區域分佈均衡的管理模式。在菁英策略方面，一方面延續 1980 年代所建立的重中之重的策略，藉由「211 工程」、「985 工程」的推動，集中資源於少數菁英大學和重點學科發展，另一方面建立研究生教育之評鑑，以激發菁英大學之間的競爭。在均衡方面，仍是延續傳統的地區分佈考量因素，以及多項優待政策，為弱勢地區注入新的活力。質言之，在中國大陸過去十多年研究生的發展與轉型見到國際潮流與本土發展特質的結合，不僅帶動了研究生教育的擴張，同時亦完成研究生教育金字塔的建構，展現了高度的效能。

然而，如本論之分析，新世紀初的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面對的挑戰，不僅止於傳統的區域發展均衡，持續提升關注弱勢群體的需求和品質的提升，也同時面對了其他國家所共有的議題，如大學的趨同性發展、教育機會均等理念、教育消費的需求，以至於中央、地方、學術之間，大學內部行政與學術管理之間關係的調整，以及教育和學術資源分配等。對於這些議題的浮現，可從兩種不同的角度觀之。消極論者將其歸之於全球化衝擊的負面效應，積極論者視之為與國際接軌的另一面。不論那一種角度，都顯示現今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體制的發展仍然在轉型的過程當中，需要更大的突破，而此一突破仍繫於決策者對於新議題的定位，亦即繫於其對於本土研究生教育發展特質與國際發展潮流的認知和定位。

2005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日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除了確認「以人為本」的基本方針，並將傳統的「計畫」之名稱改為「規劃」，預示著國家角色之調整。今年 11 月，眾所矚目的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閉幕，相關之政策即將逐一推出。研究生教育究竟是持續前 10 年

的路線，還是有更新的突破，值得持續觀察。

* * *

(收件：96年6月13日，修正：96年8月20日，複審：96年11月22日，接受：96年12月2日)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ina's Graduate School Education under Glocalization

Juei-chi Wang

Research Fellow, Fourth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graduate school education started to expand only after 1993 and presently, the number of its students has already exceeded all other countries, secon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mainly conducted by the state policies,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policies for deregulation. Through the latter, the whole system has become more market oriented, Americaniz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tate planning and strategies for excellence, on the other hand, has succeeded in building up the pyramid structure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education. Such high efficiency, however, has been encountering both old and new challenges. In the challenges can be seen the limitation of the state control.

Keywords: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glocalization; state control

參考文獻

- 「『十一五』規劃欲將『人』字大寫」，中國網，2005年1月，<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Jan/748032.htm>。
-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5zqh/1002849.htm>。
- 「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組織機構」，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檢索日期 2007年5月31日，<http://www.acgs.pku.edu.cn/zuzhijigou.html#d>。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中國勞工通訊，<http://big5.china-labour.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6010&item%5fid=6009>。
-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26.htm>。
- 「必須實事求是地建設『211工程』」，瞭望新聞週刊（北京），1995年11月，頁7。
- 「建築學專業學位設置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年11月4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77&infoid=4375>。
- 「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年11月4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77&infoid=6390>。
- 「教育部、財政部關於繼續實施“985工程”建設專案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4年6月2日，<http://www.moe.gov.cn>。
- 「教育部等五部委關於印發《培養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畫的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6年第15號，頁30~32。
- 「教育部辦公廳關於下達2008年『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幹人才』研究生招生計畫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7年9月20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179.htm>。（教民廳〔2007〕6號）。
- 200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4796.htm>。
- 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20434.htm>。
- 心怡，「中外合作辦學面面觀」，中國研究生（北京），第1期（2002年2月），頁18~19。
- 文冬梅、宋鐵波、盤芝明，「淺談定向研究生在畢業派遣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期（1994年1月），頁14~15。
- 王根順、焦煒，「21世紀我國研究生教育學科點佈局的戰略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2期（2003年12月），頁14~17。
- 王尋，「研究生收費：改革一小步」，中國新聞週刊（北京），2006年9月25日，頁34~51。
- 王瑞琦，「從市場機制的發展看西部大開發中人力資本投資的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3期（2002年5月），頁1~25。
- 王瑞琦，「論九〇年代大陸『考研熱』與研究生教育之走向」，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

- 第 5 期 (1999 年 5 月), 頁 85~104。
- 王瑞琦,「論加入 WTO 後,中國人力資本發展策略的變與不變」,許光泰等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 6 月 1 日),頁 49~78。
-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 王瑞琦、胡宇芳,「國家控制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 (2004 年 12 月),頁 75~105。
- 王樹生,「輝煌 863—哈爾濱工業大學承擔 863 計畫 15 週年回顧」,《國防科技工業》(北京),第 3 期 (2001 年 3 月),頁 49。
- 《中國教育年鑑 1987-2000》(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1987-2000 年)。
- 《中國教育統計年鑑 200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朱允衛、易開剛,「目前我國一級學科評估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 12 期 (2004 年 12 月),頁 28~30。
- 李林、李忠,「現狀、原因及改革:研究生欠費問題探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8 期 (2006 年 8 月),頁 25~30。
- 李純青、馮江紅,「非重點院校研究生教育學科建設的思考」,《河南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職業教育版)》(河南新鄉),第 1 期 (2004 年 2 月),頁 85~86。
- 李碩豪,「我國大學存在的幾個悖理現象」,《高教探索》(廣州),第 3 期 (1999 年 6 月),頁 47~49。
- 李濤,「高校重點學科評估的內涵、實施步驟和意義」,《大同醫學專科學校學報》(山西大同),第 1 期 (2004 年 3 月),頁 43~45。
- 汪曉唯、陳濤,「淺論一流省屬綜合性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機構建設」,《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湖北宜昌),第 26 卷第 1 期 (2004 年 1 月),頁 86~88。
- 邢志杰,「中國大學異地辦學的發展與問題研究」,《現代大學教育》(湖南長沙),第 3 期 (2005 年 6 月),頁 104~108。
- 周孜、周留根,「應對農科博士生擴招帶來的壓力的措施探討」,《高等農業教育》(遼寧瀋陽),第 12 期 (2003 年 12 月),頁 73~75。
- 季劍平、席與亨、徐玉良、陳善忠,「高校科研管理學科建設管理協調與運作機制」,《科技創業月刊》(湖北武漢),第 3 期 (2006 年 3 月),頁 95~96。
- 林祥任,「後進省(區)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 1 期 (1995 年 1 月),頁 63~65。
- 胡宇芳,「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人才強國』策略之分析:從高等教育區域發展差異的角度觀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 原春琳,「北大清華碩士生報考數持續走高—近兩萬人報北大 1.5 萬餘人報清華熱門專業依舊 MBA 報名人數減少」,《中國青年報》(北京),2005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

- 晏揚，「冷看“考研熱”」，*文匯報*（上海），2005年1月27日，引自 Wisenews 資料庫。
- 殷亞利、任翠，「定向招收碩士生的體制與改革」，*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6期（1994年6月），頁12~14。
- 秦發蘭、汪華、彭彬、胡承孝，「實施校院兩級管理，推進研究生教育管理創新」，*高等農業教育*（遼寧瀋陽），第11期（2006年11月），頁63~65。
- 高桂娟、朱佳麗，「從治理角度看我國學位管理體制的改革」，*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湖北武漢），第2期（2007年4月），頁112~115。
- 張永澤、岳志偉、余伯陽、于鋒，「淺議我國研究生招生考試初試科目『四改三』的必要性」，*中國高等醫學教育*（浙江杭州），第6期（2007年6月），頁5~7。
- 張波、方耀楣，「正確處理『211工程』建設中的若干關係」，*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0期（2002年10月），頁21~24。
- 張虹，「異地辦研究生教育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1期（2003年11月），頁14~16。
- 張純成，「學科評估中的誤區與矯正」，*自然辯證法通訊*（北京），第6期（2006年12月），頁10~11。
- 張慧淵、徐樅巍，「關於高等學校學科建設規劃若干問題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5期（2003年5月），頁6~8。
- 張應春、丁毅強，「試談地方高校發展研究生教育之策略」，*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7期（2003年7月），頁30~31。
- 曹慧旻，「我國研究生創新教育的現狀及對策研究」，*河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3月）。
- 梁傳杰、羅勤、梁碧濤，「對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調整的回顧與思考」，*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1期（2007年1月），頁35~37。
- 郭新立，「以重點建設帶動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1期（2003年11月），頁2~5。
- 郭新立，「從大學功能累積分佈規律看高等教育重點建設」，*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19期（2003年10月），頁15~17。
- 章曉莉，「“考研熱”背後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江蘇工業學院學報*（江蘇），第7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59~61。
- 傅斌，「關於『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的思考」，*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2期（1996年1月），頁12~13。
-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課題組，「我國碩士學位類型若干問題的探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期（1995年1月），頁55~59。
- 焦新，「今年研究生招生體現四大特點」，*中國教育報*（北京），2005年4月1日，第2版。

- 華鶴霞、陶美重，「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擔當議」，*教書育人*（哈爾濱），第1期（2006年1月），頁12~13。
- 楊君游、林功實，「加強異地辦研究生教育管理鏈的構建」，*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2期（2005年1月），頁32~33。
- 楊致錄、薛迪生、朱征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設立高校面臨的形勢及對策」，*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7期（1987年4月），頁44~46。
- 楊振寅、鄧廣、劉新立，「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期（2003年6月），頁101~107。
- 楊衛，「研究生教育：通向教育強國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05年7月7日，<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2964.htm>。
- 萬雪玉、馬應征，「新疆校碩士研究生生源分析」，*民族教育研究*（北京），第3期（2007年6月），頁30~32。
- 葉紹梁、廖文武，「對高校研究生院建設中若干基本關係的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1期（1997年1月），頁43~48。
- 趙小芳，「高校研究生管理制度改革與院系學術權力的發揮」，*理工高教研究*（湖北武漢），第25卷第3期（2006年6月），頁36~37。
- 趙東，「考研現狀及背後」，*河南教育（高校版）*（河南鄭州），第1期（2006年1月），頁15。
- 齊欣，「研究生院建設的若干問題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3期（1998年3月），頁48~50。
- 劉文達，「應重視和加強高等學校的基礎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11期（1987年4月），頁30~31。
- 劉萬永，「考研人數增幅為何回落」，*中國青年報*（北京），2003年12月9日，第5版。
- 劉增輝，「研究生收費：一場小心翼翼的改革」，*教育與職業*（北京），第31期（2006年2月），頁40~41。
- 劉輝、侯春山編，*中國研究生教育和學位制度*（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
- 鄭永流，「學術自由及其敵人：審批學術、等級學術」，*學術界*（安徽合肥），第104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78~186。
- 盧曉東，「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費定價與資助政策研究報告—基於多因素市場決定論的院校個案」，*復旦教育論壇*（上海），第6卷第1期（2003年2月），頁18~34。
- 薛天祥、楊曉江，「走向21世紀的研究生教育」，*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第6期（1997年6月），頁53。
- 薛靜、陳洪根、張駿，「研究生院核心競爭力及其提升途徑研究」，*中國高教研究*（北京），第2期（2004年），頁23~25。
- 謝伏瞻，「五個統籌是新的改革觀和發展觀」，*中國經濟時報*（北京），2003年11月21

-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446779.htm>。
- 鍾敬玲、吳松，「中外合作辦學與研究生教育國際化」，*中國研究生*（北京），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21~23。
- 顧海兵，「對我國學術管理制度改革的諫言」，*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 21 期（2003 年 11 月），頁 29~31。
- Altbach, Philip G. & Toru Umakoshi eds., *Asian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Blume, Stuart,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Dilemma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21, no. 3 (1986) , pp. 217~222.
- Carnoy, Martin and Diana Rhoten, “What Does Globalization Mean for Educa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6, no. 1 (February 2002) , pp. 1~9.
- Cherwitz, Richard A. & Charlotte A. Sullivan,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hip: A Vision for Graduate Education,” *Change*, vol. 3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 pp. 23~27.
- Henkel, Mary and Maurice Kogan, “Research Training and Graduate Education The British Macro Structure,” in Buton R. Clark 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 Germany,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 (Berkerl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93) , pp. 71~114.
- Huisman, Jeroen and Rajani Naidoo,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 from Anglo-Saxon to European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 18, no. 2 (2006) , pp. 1~13.
- Knight, Jane,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8, no.3 (2004) , pp. 5~31.
- Marginson, Simon & Gary Rhoades, “Beyond National States, Markets, and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A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 *Higher Education*, vol. 43, no. 3 (2002) , pp. 281~309.
- Meiras, Sandr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Understandings, Dimensions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vol. 26, no. 3 (2004) , pp. 371~380.
- Newman, Frank and Lara K Couturier, “The New Competitive Arena,” *Change*, vol. 3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 pp. 10~18.
- Nyquist, Jody D., “The Ph. D: A Tapestry of Cha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Change*, vol. 3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 pp. 13~20.
- Okazaki-Ward, L. I., “MBA Educ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 20, no.3 (2001) , pp. 197~234.

- Rhoades, Gary, "Globally, Nationally, and Locally Patterned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l. 43, no. 3 (2002), pp. 278~309.
- Rhodes, Frank H.T., *The Creation of the Future: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Y: Cornell University, 2001) .
- Ross, Heidi, Jingjing Lou, "'Glocaliz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Groping for Stones to Cross the River,"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12, no. 1 (Winter 2005), pp. 227~250.
- Scott, David, Andrew Brown, Ingrid Lunt and Lucy Thorne, *Professional Doctorates: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Knowledge* (Maidenhead,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Ushio, Morikazu L.,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Japan," in Buton R. Clark 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 Germany,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99~325.
- Vaira, Massimiliano,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vol. 48, no. 4 (December 2004), pp. 483~510.
- Vogel, Martin, "Diversity and Comparability—Towards a Commo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November 16, 2006,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8g855120122t4520/fulltext.html>.
- Wolf, Alison, *Does Education Matte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2) .
- Yang, Ru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Its Meanings, Rational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vol. 13, no. 1 (March 2002), pp. 81~94.
- Yang, Rui, *Third Deligh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